

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的驱动因素分析

王 晰

摘要：本文结合印度经济转型背景，分析了其对华反倾销的总体特征和可能影响其裁决结果的政治经济因素。Logit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因素在其裁决结果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无关性，这有别于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结论。印度对华反倾销的驱动因素在于产业层面：进口渗透的威胁和产业业绩下降往往会导致肯定裁决结果的出现；相比强势厂商，集中度较低、易受损害的弱势厂商受到更多照顾；具有战略意义的化工产业，无论在转型前后都得到了反倾销当局的特殊照顾；中国入世的制度因素并未对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形成遏制。

关键词：印度；对华反倾销；政治经济分析

一、引言

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出口额世界排名跃居到第一位。报告说，“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WTO公布的一组令国人尴尬的数字：2009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案例占全球的40%，反补贴案例占全球的75%，遭遇贸易调查数占全球案件总数43%，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此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值得引起我国企业和产业的重视。其中之一就是印度已经取代了美国、欧盟等传统“反倾销俱乐部”成员成为对华反倾销的头号大国，根据WTO统计，1995-2009年印度共对华发起反倾销137起，占其对外反倾销比重22.3%，远超排名之后的韩国（44起）、中国台北（41起）、欧盟（40起）。中国企业在应诉印度反倾销的胜诉率也很低，在印度发起的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有90多起采取了最终措施，成功率超过75%。作为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印度对华反倾销的活跃度远超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这其中一定存在问题。这种背景使得探究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的驱动因素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从政治经济角度对贸易保护和反倾销研究的多数国外文献都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基础。观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从利益集团的需求面出发，研究了利益集团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际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09YJC790081）、湖南省社科重点项目（2010ZDB51）、湖南农业大学国际贸易重点学科项目资助。

王晰：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 410128 电子信箱：Shuc212@yahoo.com.cn。

予以政府提供贸易保护压力的数量和类型。如进口竞争集团如何通过特定的“政治通道”向相关政府机构施加保护主义压力 (Nelson, 1988), 以及出口产业和企业的影响 (Conybeare, 1983; Milner, 1988)。一些研究还显示利益集团特征会影响反倾销政策结果: 首先是利益集团的产出和劳动雇佣规模 (Hanson, 1990; Hathaway, 1998), 其次产业集中度和厂商数目 (Pincus, 1975; Godek, 1985), 再次是厂商所拥有的政治代表数量 (Prusa, 1997), 最后是特定团体如资本和劳动密集的钢铁产业可受到特殊照顾 (Hansen and Prusa, 1998)。(2) 另一类观点侧重考察了行政官员在特定保护政策供给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 行政官员为追求任期更好的宏观经济业绩而偏好自由贸易政策 (Bhagwati, 1990; Krueger, 1998), 然而出于较短任期带来的选举压力也不得不以反倾销保护换取利益团体的政治选票。(3) 一国政府在作出反倾销政策决定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来自国内的压力, 政府也有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要完成, 因此, 有时无论是否有国内压力存在, 政府也会积极的进行“政策供给”以实现更加全局性的和长远的政策目标 (Nelson, 1988)。

有不少国外文献对其进行了理论和经验探讨。Francois 和 Niels (2003) 发现 1992 和 1993 年墨西哥的反倾销案件一度高涨, 其中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比索的强劲升值, 另一方面解释是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巩固更多政治支持。Niels, Gunna (2004) 的研究也发现墨西哥在宏观经济形势下滑及存在政治利益时使用反倾销措施更加频繁。G.Niels, A.T.Kate (2006) 进一步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动机——与其说是针对不公平贸易, 不如说是贸易自由化过程换取政治支持的讨价还价工具, 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 WTO 反倾销守则, 反补贴和安保措施同样可以满足政府的政治需求。Nandana Baruah (2007) 对印度 1992-2002 年的反倾销特征做了实证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进口增长和产业的经济业绩下降对反倾销当局的终裁并未起到重要影响, 相反, 那些产业集中度低的产业往往能得到肯定的裁决, 他认为这体现了印度政府对脆弱的、易于遭受外部冲击的产业的同情。Barral, Brogini, Lucenti 和 Aggarwal (2005) 的实证结果显示许多频繁使用反倾销的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及南非, 企业财团化及国内市场占有率高情况普遍, 在自由化后, 往往运用政治影响力寻求政府保护。例如印度申诉企业市场占有率达 90% 以上, 而南非 1991-1998 年间, 68% 的反倾销案件由国内唯一厂商提出。

总体来看, 目前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贸易保护和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已经比较成熟, 形成了一套多视角的完整理论体系, 然而对于与发达国家政治制度存在差异, 经济处于转型性质的发展中国家, 已有理论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毕竟不同政治制度下各利益团体的政治地位不同, 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也不同, 处于转型状态的国家政府的经济政治目标也有其鲜明特点, 在处理内外关系上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特征。现有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研究的政治经济文献已经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特征, 然而深入理解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政策结果的政治经济因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所要揭示的并非是变量间含糊的数字联系, 而是要结合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理解经济自由化和高速增长过程中政府对不同产业的微妙态度以及产业进行反倾销的真实动机。

三、印度与对华反倾销的总体特征

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行为往往是伴随着一个向贸易自由化过渡的政策变迁而产生和发展，印度也不例外。在过去，印度并未求助于反倾销这样的有条件的保护措施，因为当时印度的内向型经济体制较多依赖的是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措施。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的政策导向发生了重大变迁，印度经济对国外竞争的开放度不断增强。除了经济改革措施出台，印度也随着GATT/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制度的变迁而调整了贸易政策，如去除了数量限制措施自由化进口，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从1991年128%降至2005年的22.4%）等等。就在这个时期，印度开始大量使用WTO许可的“贸易防卫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安保措施等等，其中反倾销措施占绝大部分，大约占到这三种措施总和的八成以上。也就在这一阶段，印度开始将矛头对准中国，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指控数和实施数开始大幅上升，特别是WTO成立以后，印度逐步超过了美国和欧盟，成为全球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根据印度商工部的官方记录，印度对华反倾销的第一起案件为1994年1月7日发起的异丁基苯案，共对我国的6家出口商提出了指控，并于1995年8月31日起对这些厂商征收了每公吨10634卢比的从量反倾销税。此后，印度对华反倾销数量一路上升，2001年和2002年达到峰值14件，随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比起反倾销传统的用户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如图1所示，在所有发起的案件中，最终征税的比重非常高，由于印度基本上不接受价格承诺，直到1997年所有案件都导致了征税，此后成功率基本都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注：印度案件统计标准与WTO有所不同，印度统计把一次发起案件一类商品中不同海关编码的商品和不同国家的企业都归为一类，此外目前印度商工部只正式公布了到2005年底案例的详细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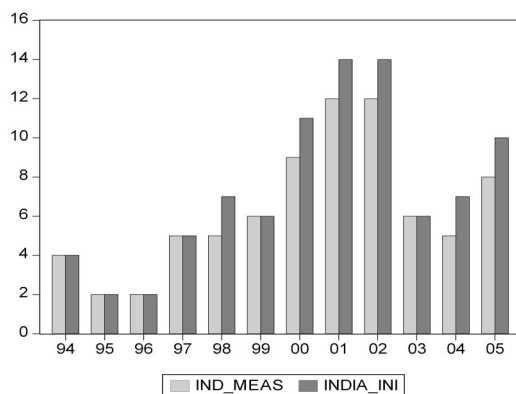


图1 1994—2005年印度对华反倾销发起和实施数

考虑到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成千上万种商品，印度对华反倾销突显出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大多数案件集中在少数几个较窄的产品分组之中。印度商工部截止目前公布最新的反倾销报告是反倾销报告2005—2006年，其中将印度对外反倾销的

表1 截止2005年底印度对华反倾销分组统计

(单位: 件、%)

产品组	全球发起数	百分比	对华发起数	百分比
化学和石化	82	43.6	46	52.3
制药	29	15.4	16	18.2
纺织/纤维/纱	21	11.2	7	8.0
钢铁和其他金属	14	7.5	6	6.8
消费品	15	8.0	6	6.8
其他	27	14.4	7	8.0
总计	188	100.0	88	100.0

资料来源: 印度商工部反倾销案例统计整理计算。

产品归入了6个产品分组, 笔者按照该标准整理了印度对华反倾销的产品分组, 在此作一对比。

在印度截止2005年底对华反倾销的产品组中, 出于最显著位置的是化学和石化产品, 在总计88件案件中, 46件(52.3%)属于这一组, 制药产品以16件(18.2%)占据第二, 这两组产品是印度对华反倾销的传统产品, 从1994年以来不断遭到印度的指控, 合计占印度对华反倾销70.5%, 这个比重高于印度对全球反倾销的比重。接下来是纺织品8%, 钢铁6.8%, 消费品6.8%, 其他8.0%。钢铁产品是世界范围内反倾销最热的产业, 全球发起数大大高于化工产品, 然而在印度, 它无论是对全球的比重还是对华反倾销比重, 均不占据重要地位。值得关注的是, 消费品和纺织品是2000年以后,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印度反倾销的新目标, 其数量呈现增长趋势。总体看来, 印度对华反倾销与对全球反倾销相比, 主要是强化了对化学石化和制药行业的指控数量。

四、可能影响印度对华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

笔者在对我国企业在应诉印度对华反倾销的胜诉案例的分析中,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我国企业胜诉的案例中, 最经常出现的原因是进口产品未对国内产业产生实质性损害, 或者是损害与倾销之间不存在随机联系, 如纸面石膏板、玩具、柠檬酸等一系列案例, 笔者并未发现有任何案例是因为裁定不存在倾销而获得胜诉的。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和替代国制度的存在导致了倾销调查过程的操作空间太大, 中国企业要想占到便宜几乎不可能, 不被裁决“天文数字”倾销幅度已属万幸。因此, 我们对各种因素更多的是围绕可能对损害的影响来展开, 毕竟损害调查没有市场经济标准和替代国制度, 客观性较强, 也将增强后文实证工作的可靠性。

(一) 进口产品占印度国内需求变动

印度反倾销当局在作出损害判定前, 将对所有有关因素进行详细、复杂的检查分析, 必须要有确实、客观的证据证明进口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同类产品产业形成实质性阻碍。首先进行的就是对进口数量影响的评估, 反倾销当局将分析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者绝对数量与生产和消费相比的相对

数量可能的影响。国外已经有许多学者探讨了进口因素对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诉和反倾销当局作出肯定裁决的影响，多数文献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如Feinberg and Hirsch (1989)、Staiger and Wolak (1994)、Furusawa and Prusa (1996)、Lee, Kyung-Ho (2003)等，这些研究都认为进口产品的市场渗透率以及国内相似产品产业的规模是决定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请的因素。他们认为进口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度量了进口国产业受竞争者损害的程度，这也是USITC决定产业损害的指标之一，所以会左右USITC是否决定提供保护的判决。Sabry (2000)重点研究了美国反倾销的程序规则并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商务部(DOC)在决定倾销幅度时，主要是参考进口占有率和产业申诉的倾销估计，并不完全比较价格，终裁则由进口占有率、产业开工率和DOC的倾销估计决定。Nandana Baruah (2007)对印度1992-2002年对全球反倾销特征做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进口增长对反倾销当局的终裁并未起到重要影响，对此，本文在印度对华反倾销实证中将进一步对此进行验证，看是否结论具有一致性。

截至2005年底，根据印度商工部数据，印度一共对华发起了88起反倾销案例，经过笔者的整理发现，有10多个案例遭指控倾销产品进口渗透率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值在0.3以上，另外有10多个案例处于0.2-0.3之间，有超过20个案例处于0.1-0.2之间，将近20个案例处于0-0.1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约10个案例这一数字等于或小于零，显示其在印度国内市场的份额处于下降趋势。(注，由于印度商工部公布的部分案例数据不完整，因此这个统计大约遗漏了8个案例)。显而易见，这一组进口渗透数字有助于推动印度国内对华反倾销的供给和需求的增长。

(二) 宏观经济因素和国际经济因素

大量研究显示宏观经济指标的剧烈波动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汇率会影响到反倾销政策的实施。政府反经济周期运作既一定程度与利益团体活动一致又能实现更佳经济业绩，而且政府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即使没有利益团体游说也将着手处理经济问题，因此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力更广泛(Nelson, 1986, 1988)。目前国外已有大量经验文献研究了宏观经济波动与各国政府反倾销行为的联系。如Mah (2000)探究了美国ITC反倾销决定的宏观经济因素，结果发现，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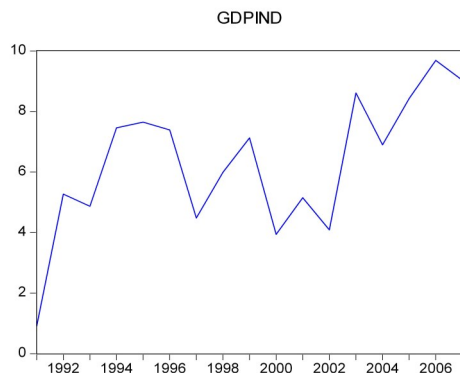


图2 1991-2007年印度经济增长率

倾销肯定裁决百分比增长与贸易差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贸易差额对反倾销肯定裁决百分比增长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Lee Kyung (2003) 也从美国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出发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与政治制度因素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倾销案例损害裁定。Michael M.Knetter和Thomas J.Prusa (2003) 则利用的是四个反倾销主要起诉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以及美国）1980-1998年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本币升值和国内总产值下降是反倾销申诉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由内向型经济转型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1990年代增长率直线上升到7%左右，随后10年一直维持平均6%左右的增长率，然而年度之间增长率波动较大，2003年创超过8%的新高，到了2006年，增长率近乎1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另一方面从贸易收支数据看，根据WTO数据，印度的贸易收支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出于逆差状态，且逆差不断扩大，从1995年的40.7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712.97亿美元。再加上到目前印度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的外债水平，笔者推测，处理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和贸易逆差有可能是印度政府供给反倾销保护的重要考虑。

（三）国内产业的经济状况

进口增长的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反倾销当局采取措施，除非它确实给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印度反倾销当局对于进口产品倾销给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通常以以下经济指标加以分析：产量、销售收入、市场份额、利润、投资回报率、生产能力、产能利用率、价额、就业人数、库存、工资水平等等。但是经过对印度公布的案例整理发现，反倾销当局并不是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公布了所考察的经济指标的详细信息，在所有案例中数据比较完整的是国内产业的产能和产量信息。特别是产能利用率这一指标，被反倾销当局长期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指标来衡量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产能利用率反映了两方面信息：一方面是企业产量的变化；其次是企业生产能力的变动。特别对于印度的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反倾销产业而言（对此后文详细分析），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将导致生产无法达到有效率的生产规模，从而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降。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各产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可能对其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图3显示了印度对华反倾销各产业的产能利用率的变动情况，总体看来，并非所有的对华反倾销的申诉产业都出现了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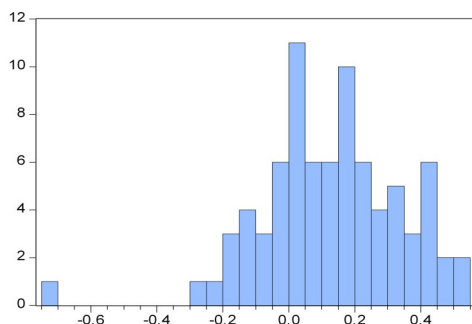


图3 印度国内产业产能利用率下降比重分布

绩下降的状况，然而的确它们中的许多企业经历了产能利用的下降和利润边际的减少。尽管这些情况的出现并不一定是由于我国产品倾销所致，但是倾销和经济业绩下滑现象的并存意味着倾销产品有可能是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之一，因此会影响调查当局进行调查和最终的裁决，同时不佳的经济业绩也会刺激国内产业进行大量的游说活动。

（四）申诉厂商的市场份额

过去数十年来国外学者一直在探讨市场结构可能会影响贸易保护的政治结果。最早的如Olson（1965）提出在一个产业如果生产和所有权集中在少数的企业，那么更能克服“免费搭车者”的困境，同时也拥有更多资源来克服组织、游说、诉讼成本，从而有效的影响政策结果。M.R. Czinkota（1997）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实证发现产业集中度是决定ITC裁决结果的最显著因素之一，ITC裁决中更加偏好那些具有稳定而均衡的市场份额的集中产业。印度的商工部在反倾销案例中提供了一些关于申诉厂商数量、市场份额和国内产业厂商数量、市场份额的数据，然而，并非每一个案例都提供了完整的信息，因此本文拟从申诉厂商数量和市场份额的角度对印度国内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做一描述。从总体数据来看，申诉产业国内市场集中度是相当高的。在截止2005年底对华反倾销的案例中，有超过一半的案例，申诉产业只有一个厂商，平均市场份额为89.3%，有超过30%的案例，申诉厂商为2-4个，平均市场份额为71.0%，另外有10%左右案例，申诉厂商数量超过5个以上。这组数字清晰的显示了申诉厂商在国内产业的支配地位，也与不少对美国的经验研究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相对分散的产业的申诉数量占美国对外反倾销总量的50%以上。由此，笔者推断，发达国家的国内厂商发起反倾销的动机与发展中国家厂商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中小厂商提起反倾销多少还具备一些经济理性的话，发展中国家厂商的反倾销动机更可能处于维护其在垄断地位条件下无效率的生产。

（五）其他因素

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主要发生在两个主要的部门：化工和石化、制药部门。这两个部门具备一定的科技含量、资本密集型特征和规模经济特征，也是中印双边贸易的敏感部门，尽管这些部门的印度企业几乎都处于行业支配地位，然而都尚未达到可以进行全球竞争的有效经济规模和生产效率，在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当这些部门面临产能过剩、廉价进口威胁、利润下降的不利形势时，印度政府对于这些部门的微妙态度是值得探究的，因此本文的实证部分将对此进行验证。

最后，本文的实证中还将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入世对印度反倾销行为的影响，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不断提高，也是世界各国争夺的重要市场，享有了作为成员合法使用安保措施的权利，同时可以借助于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国家的违规行为进行申诉。由此本文推断，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可能对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形成一定的威慑作用。因此，检验我国入世对印度反倾销当局行为的影响也是实证部分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印度对华反倾销裁决影响因素的经验检验

本文预测各种一般性政治经济因素对反倾销当局的终裁决定起到重要的影响。政治上，笔者预计申诉产业的市场力量将强烈的影响到反倾销的保护性需求和供给；本人也预计宏观经济因素和国际经济因素如GDP、中印贸易差额以及进口压力、产业的表现也将调节反倾销当局的终裁决定；其他的如行业和制度因素也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基于以上考虑，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Final（反倾销当局的终裁决定）= $C_0 + C_1X_1$ （政治力量因素）+ C_2X_2 （宏观和国际经济因素）+ C_3X_3 （进口压力和产业业绩因素）+ C_4X_4 （其他因素）

由于决定变量Final是一个代表案例是否产生一个肯定或否定终裁结果的二元变量，决定变量的性质暗示了使用最大似然Logit模型。决定变量的数据取自印度商工部的2005-2006反倾销报告，出于模型所有的变量的完整性考虑，本文去掉了一些数据缺失的案例。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使用了目前可利用的统计来源提供的数据，作为对利益集团力量的度量，选择了申诉厂商的市场份额Firm，这一组数据取自商工部官方公布的案例数据和印度Prowess数据库和以及印度国家统计局。为了显示宏观和国际经济的约束条件，本文选择了印度年度GDP增长率和中印贸易赤字TB，分别取自美国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至于代表进口压力和产业表现的变量，选取的是进口渗透率的变动MS和产能利用率的下降比PD，分别取自印度反倾销案例库和Prowess数据库。另外，我们设置了虚拟变量Chemistry和Pharm、WTO，分别代表政府对化学和石化、制药行业的关注以及中国入世的影响。最后，所有的数据时间跨度为1994-2005年。

表2 数据描述

变量	含义	样本均值	样本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Final	印度反倾销总局是否裁定征税（征收1，否决0）	0.824	0.383
解释变量			
MS	上年度与本年度进口渗透率差额	0.153	0.131
GDP	上年度印度经济增长率	0.057	0.016
TB	上年度中印贸易赤字占印度贸易赤字总额比	0.080	0.043
FIRM	申诉厂商的市场份额	0.793	0.221
PD	产业与上年度比较产能利用率下降比	0.131	0.216
Chemistry	是否属于化学和石化产业（是1，否0）	0.456	0.502
Pharm	是否属于制药产业（是1，否0）	0.210	0.411
WTO	中国入世虚拟变量（2001年前取0，2001年后取1）	0.439	0.50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2可以看出, 决定变量的均值为0.824,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从样本中抽取一个案例(本文的样本没有考虑发起申诉而不予立案的情况), 那么这个案例得到印度反倾销当局肯定裁决的概率达到了82%。对如此高的成功率, 可能的解释是我们选取的案例都通过了印度反倾销当局的立案审查并在通过了反倾销的初裁阶段, 因此基本上都达到了得到肯定终裁的最低要求。

在运行模型之前, 我们先对解释变量之间以及解释变量与决定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 发现仅部分解释变量显示了与决定变量的较高的相关性, 如PD (0.52)、MS (0.56)、Chemistry (0.33)、Firm (-0.19)、TB (0.15)。考虑到其余变量与决定变量之间较低的相关度, 我们决定仅用以上几个变量来运行logit回归模型。然而, 在解释变量之间, PD和MS具有较高的相关性(0.51), 因此我们将运行两次logit回归, 每次只使用其中一个变量。两个模型的运行结果Model1和Model2显示如下:

表3 Logit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预期影响方向	Model1		Model2	
		机会比率	标准差	机会比率	标准差
MS	+			0.38***	0.29
PD	+	0.35***	0.54		
Firm	+/-	-0.32*	0.21	-0.39*	0.20
Chemistry	+	0.30**	0.62	0.24**	0.43
TB	+	0.11	0.91	0.12	0.65
Mcfadden R ²		0.61		0.65	
LR Statistics		42.9		45.3	

注: ***代表在1%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5%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10%水平下显著“机会比率”按照古扎拉蒂(1996)的换算方法: 取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反对数, 然而减1并乘以100, 由此得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模型1的结果显示, 在所有5个解释变量当中, 有4个解释变量表现出了较好的显著性水平, 只有TB(中印贸易赤字)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模型2中我们用MS(市场渗透率变动)替代了PD(产能利用下降比), 结论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模型2有同样4个解释变量表现显著, 而TB(中印贸易赤字)同样未通过检验, 两个模型中显著性变量的符号基本保持一致。从模型的总体统计量来看, 模型1和模型2的Mcfadden R²分别为0.61和0.65, LR统计量分别为42.9和45.3, 说明模型的拟合得比较好。

在印度反倾销当局终裁调查中用于评估产业损害的两个关键经济变量MS(市场渗透率变动)和PD(产能利用下降比)分别在模型1和模型2中以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 对决定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由机会比率可知, 中国产品在印度市场的进口渗透率变动每增加1%, 得到印度反倾销当局肯定终裁的可能性将提高38%, 印度产业的产能利用下降比每增加1%, 得到肯定终裁的可能性将提高35%。从这个角度看, 印度反倾销当局对进口和产能变动的反映似乎显示

了其对于贸易自由化承诺的“尽职尽责”，因为按照WTO反倾销守则，反倾销税的实施应当也仅仅应当基于上述产业救济的经济理性，这同时也清晰显示了印度反倾销当局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于产业状况（产能、获利等）的积极关注。当然，考虑到印度反倾销当局获取这些关键变量数据主要还是通过相关的产业主管部门，而不是通过如海关或其他更值得依赖的信息来源，我们有理由相信产业主管部门有时会出于自身利益“误报”产业的状况，因此我们对待这些结论还是要持慎重态度。

衡量申诉厂商市场份额的变量FIRM在模型1和模型2中都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测试，然而符号为负。从机会比率来看，申诉厂商的市场份额越大，则其得到反倾销当局肯定裁决的可能性反而会下降，这似乎与一些传统理论和经验结论观点相反。如Olson（1965）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在一个产业中，如果生产和所有权集中在少数的企业，那么这些较大的企业更能克服“免费搭车者”的困境，同时也拥有更多资源来克服组织、游说、诉讼成本，从而有效的影响政策结果。我们推测，由于印度反倾销当局很大程度上关注的重心是在产业状况上，那么市场份额相对较低的国内厂商可能经济实力也相对较弱，因此在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时抗风险能力也更弱，因此更容易招致损害的发生，这也许是这些厂商更容易获得肯定裁决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在Leidy（1997）的文章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在模型1和模型2中另外一个呈现显著的变量是代表化工和石化产业的变量Chemistry，以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测试，且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从机会比率来看，涉及到反倾销终裁的案件如果发生在化工和石化行业，那么反倾销当局终裁肯定的概率将大大提高。这与本文前面的统计分析保持一致，印度对华反倾销约52.3%发生在化工和石化部门。那么印度反倾销当局为何如此关照化工和石化产业呢？对此解释必须要结合印度经济转型的背景。化工和石化产业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产业，同时也是具有资本密集和规模经济特征的产业。印度经济在向开放型经济过渡之前，印度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弱化的专利保护来战略性扶植化工和石化产业成长，然而这种内向型经济导向的政策被证实是不成功的，由于缺乏国内竞争、持续使用过时的技术导致这些产业无法获得能够在全球层面竞争的经济规模，战略性扶植目的并未达到，反而在印度90年代向开放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开始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因此，印度政府一方面不得不运用WTO允许的反倾销政策为过去失败的产业政策“买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由于垄断地位受到威胁而日益活跃的利益集团的要求，以为未来进一步的执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稳固政治支持。

两个模型的结果以及前面对相关系数的检验清晰的显示，宏观经济因素和国际经济因素如GDP增长率、贸易赤字并未如我们期待的影响印度反倾销当局的终裁行为，由此我们推断是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因素以及利益集团的因素决定印度的反倾销裁决。另外，中国入世这样的制度因素也没有如我们期待，使得印度对华反倾销有所“收敛”，这可能源于2个因素：（1）中国入世以后，对印度的反倾销强度太低，根据WTO统计，截止2008年，我国仅对印度发起和实施了4起反倾销措施，因此对印度的威慑力有限；（2）我国也基本没有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对印度

反倾销进行申诉，由此导致了WTO因素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结论

本文通过初步的、尝试性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测试，试图对处于后转型时期的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形成反倾销政策结果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特别地，本文试图探索对于印度经济改革产生重要反应的一系列解释变量，这对于理解一个关键的、新兴的中等收入东南亚国家反倾销当局对华反倾销裁决的调节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本文合理和准确地应用了此前在发达国家反倾销政策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一些理论，结果显示，这些理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印度对华反倾销的政策结果以及最近并不十分清晰的贸易自由化的倒退过程。本文的经验结果显示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印度对华反倾销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的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了GDP、贸易赤字等因素在印度对华反倾销政策结果形成过程中的无关性，产生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过去十几年来印度经济的相对稳定的高增长。本文这一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反倾销行为分析，毕竟与印度相比，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等还处于经济困境的挣扎之中，因此未来还有待于更多宏观经济因素的经验检验应用于其他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以对比本文的结论。

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驱动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的重要因素在于产业层面，那些在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型过程中遭受了极剧增长的进口渗透和经济业绩不断恶化的产业受到了印度反倾销当局的较多照顾，当然这种符合WTO贸易救济原则的照顾也似乎兑现了印度参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印度的这种行为是同其自身在经济转型中的政治经济目标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在政治上安抚部分由于经济转型而受损的日益活跃的国内利益集团以继续推进外向型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扶植国内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弱势产业成长以实现长远的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本文对于申诉厂商市场份额的经验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分析，相对于那些高集中度的强势厂商，集中度相对较低，易于遭受国际竞争损害的中小厂商受到了反倾销当局的相对更多的照顾。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像化工和石化这样的具备一定科技含量、具有资本密集和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也受到了额外特殊的照顾，一半以上的反倾销措施都是在这个产业实施，本文推断这种现象是过去内向型经济环境下产业战略性扶植政策在现在外向型经济环境下的延续，毕竟过去的内向型政策并未使得化工和石化产业成功地达到全球竞争的经济规模，反而延续了过去对传统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依赖，因此，印度对华化工产业的反倾销政策很可能是其对传统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此外，本文还发现，像中国入世这样的制度因素并未如先前所预测使得印度对华反倾销产生收敛。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行为分析，相对于对美国 and 欧盟的分析，数据的不充分一定程度限制了我们进一步得出深入的认识。我们期待，未来印度更深入地参与WTO这样的多边贸易组织和一些区域性贸易组织会迫使其政府改进其提供的数据和信息质量，从而使未来的研究得以优化。特别是

如果印度、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设置一些机构比较透明地展示利益团体的政治献金数据，那么未来有可能在利益集团、政府、反倾销当局与反倾销政策产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 Nelson, Douglas., (1988) "Endogenous Tariff Theory: A Critical Surve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August) : 796-837.
- Milner, Helen., (1988) "Resisting Protectionist Temptation: Industry and the Making of Trade Policy in France and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4 (Autumn) : 639-65.
- Hathaway, Oona., (1998) "Positive Feedback: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tion on Industry Demand for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3 (Summer) : 575-612.
- Prusa, T.J., (2001) "On Spread and Impact of Antidumping,"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3: 591-611.
- Niels, Gunna and Francois, Joseph F., (2004) Political Influence in a New Antidumping Regime: Evidence from Mexico (Manuscript) .
- Bhagwati J., Departure, (2001) "From Multilateralism:Regionalism and Aggressive Unilat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 Dec.
- Niels, Gunna and Kate, Adriaan, T, (2004) *Antidumping Protection in a liberalizing Country: Mexico' s Anti-dumping Policy and Practic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Feinberg, R.M., (1989) "Exchange Rates and Unfair Tradem,"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1:704-707.
- Knetter, M.M.and Prusa,T. J., (2003)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61:1-17.
- Nandana Baruah, (2007) "A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nti-dumping Behaviour in India," *The World Economy* 1, 467-497.
- Lee, Kyung-Ho and Mah, Jai S., (2003)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Antidumping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25:555-565.
- P K.M.Tharakan, (1999) "Is Antidumping Here to Stay," *The World Economy* 22 (2) .

(责任编辑 蒋荣兵)

Factors Influencing Behavior of India' s Antidumping to China

WANG Xi

Abstract: India' s antidumping to China is a phenomen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Based 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teratures on trade protection and antidump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verall features of India' s antidumping to China and potentially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result of Logit model indicates macroeconomic factor irrelative to behavior of India' s antidumping to China. Instead, driving factors lie in industry level. Less concentrated appealing enterprises and strategic chemistry industry have had more positive outcome. China' s access to WTO doesn' t play a strong role in restricting India' s antidumping.

Keywords: India; Antidumping to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